

舜 记 拾 遗

□ 侯彩玲

2009年,得友人赠送一套运城市虞舜文化研究会所编之《虞舜文化》系列丛书,有虞舜圣迹、古论、今论、传说和舜裔姓源等分册。拜读之后,于虞舜文化之精髓及河东地区作为舜帝活动中心之历史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迩来公务之遐,不厌抠字搜典之烦,以翻阅碑志为乐。此类文字虽曰索然无趣,不为时人所道,然片石只言,亦能释疑解惑,俾读者有一愚之得。近读《山右石刻丛编》和《唐代墓志汇编》,得舜帝记载数则,摘录于此,一补丛书之阙,二与同好共鉴。

一则见于《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中记:“然则重华文命,德冠百王,迦牟逸道,道超千佛。”文称“栖岩道场者,魏永熙之季大隋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立,于时得一未清,初九勿用,褰帷蒲坂,乃创祗园。基址首阳,夷齐乘节之地,登临妫汭,娥英降嫔之所。”此后并言“殷忧启圣,天祚明德,烟云变彩,钟石革音。诰誓起于鸣条,讴歌归于景亳”^[1]。

据此碑,栖岩寺始建于北魏永熙年间(532—534年),系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所建。北周武帝灭佛,寺遂沦荡。杨坚受禅建隋,重尊释典,在仁寿元年(601年)其母寿诞之际,诏赐舍利于全国八十州,限期建塔,为其母后祝寿,此塔乃其一也。塔即为朝廷敕建,文亦出官方之手。碑云“司法书佐、会稽贺德仁奉教撰”,即为明证。按司法书佐,本名法曹行参军,炀帝即位后更名,为隋各州郡之佐吏。文称河东首山形胜典故有三:一是伯夷、叔齐乘节之地;二是帝尧二女娥皇、女英下嫁舜帝之所;三是周柱史老聃过关之故址。碑言这些掌故发生于此地,应是大隋王朝的官方看法。对照上下文义,若没有“重华文命”,何来“娥英降嫔”之说?碑文所云之“鸣条”,也在河东,乃一绵延十数里之土岗,据《孟子》所记“舜生于诸

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此亦旁证之一。

碑记外,还有物证。首山腹地之芮城县东历山村前对黄河,背依土岭,村中原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舜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文物工作者又新发现了舜庙,应为舜帝活动河东之佐证。按东历山村地处中条山中,现隶芮城,旧属永济,古为蒲坂所辖。《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2]此地舜迹,史载最为详细。除了《汉书》、《后汉书》,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云:“(河水)又南过蒲坂县西。……今城中有舜庙,魏秦州刺史治。太平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南有历山也,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迺迳历山下,上有舜庙。”^[3]可见此处舜庙、舜井,至迟在北魏时就已有之。

文中所称之“历观”,又见于汉代杨雄《河东赋》:“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颜师古注“历观”曰:“历山上有观也。”晋灼曰:“在河东蒲坂县。”^[4]杨氏所叙,为汉成帝祀后土、览盐池、登历观之经过,不仅说明酈道元所记不虚,更将虞舜活动于河东的官方说法前提到西汉时期。惟历观之建筑,今已不知所踪。前几年,笔者到东历山村作调查,据村民言及,村东南之高阜处尚有一“黎明观”,又称显明观,现已成为遗址。传说舜勤耕早起,每至此,天始明,故名。村中并有“见帝杨树弯,舜王耕田在历山,黎明观在前面”之歌谣。

此地20世纪70年代曾出土过八棱形线刻人物石灯台,亦名道德经幢,唐天宝五载(746年)造,现藏于永乐宫。而诸《平阳府志》、《蒲州府志》和《永济县志》,却无黎明观之记载,其之毁灭早矣。黎明观不知是否即《河东赋》所称之“历

观”抑或是“历观”废弃后所建之另一道观?有待考古发掘证实。

二则见于《山右石刻丛编》卷七。唐代《圆济和尚塔铭》:“故法昌寺主圆济和尚”,“脉裔重华之后,生缘让畔之乡”。文后还有“龙象咽而云悲,虞芮惨而雨泣”^[6]之记。按《塔铭》原嵌于芮城县法昌寺正殿后壁,和尚以天宝二载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据志文,圆济僧既是舜帝之苗裔,当为姚姓。让畔之乡,即著名的闲田,又称闲原,商末虞芮二君相让之地,“俗名让畔城,在(平陆)县西五十里”,“在今南侯沟西、仪家沟东,幅员十里,颇称沃饶。”^[6]其地坐落在今平陆之西、芮城之东的两县交界地带。之所以说此为虞舜活动河东的另一例证,乃因隋唐时人撰写志铭有一固习,即均套用本地的历史掌故,以衬托志主之不凡。圆济僧即为芮人,姚姓,故塔铭如是。至于“虞芮惨而雨泣”,当系泛指虞、芮二地。

三则见于《唐代墓志汇编》诸姚氏墓志。作为姚重华之直系子孙,各姚氏墓志皆述其姓源于虞舜。但志文叙述,又因志主籍贯不同略有差异,可分为非河东籍与河东籍两类。其中,非河东籍姚氏墓志仅泛称其为舜之后裔,或述其迁籍之因,并不列举与大舜有关的历史掌故。如唐天宝十二载(753年)《姚希直墓志》:“府君讳希直,陇西人,舜之裔孙也。”^[7]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姚恭墓志》:“君讳恭,洛阳人也。昔观津延庆,章武浚其遥澜,凉辅疏基,安丰开其戚里。由是望荣七叶,声溢五陵。”^[8]贞元四年(788年)《张晕妻姚氏墓志》:“夫人姚氏,其先吴兴人也,虞舜之后。舜生姚墟,因以命氏,其后子孙徙居吴郡。”^[9]建中二年(781年)《姚子昂墓志》:“府君讳子昂,陈留郡人也。姓自帝舜之后,汉魏时有姚苾焉。”^[10]大历五年(770年)《大唐法律禅师墓志》:“大德讳常一,俗姓姚氏,其先冯翊莲芍人也。大舜之后,源流且长,冠冕相承,事传谱谍,枝叶浸远,因宦东周,今为河清人也。”^[11]而河东籍姚氏墓志,除了得姓之由,于虞舜掌故着墨甚多。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姚处璵墓志》:“公讳处璵,字望之,河东桑泉人也。自妣水分源,有虞命氏,曾祖英,祖文,考思礼,偕脱落世务,高谢王侯。”^[12]天宝元年(742年)《唐上殇姚氏墓志》:“殇子姚氏,

无字,号功德藏,河东桑泉人也。昔皇英俪虞,兆釐降之祉;大姬尚满,启神明之祚。公侯之胤,累存图谍。”^[13]天宝七年(748年)《姚知墓志》:“公讳知,字章,河东人也。承帝舜之后,孝感天下,德被仁贤,奕叶衣冠,继代不绝矣。”^[14]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二志。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姚思玄墓志》:“君讳思玄,字尚默,河东蒲坂人也。其先帝舜之后矣,惟□□□,曰则凝贞,不显不晦,黄中通理。用能阐鸿休于历□,流□□于姚墟,得性命氏,即斯之后也。”其铭辞并言“历嵎延祥,姚墟阐则”。^[15]该志明确地记载历山、姚墟皆在蒲坂。而圣历三年(700年)之《姚憺墓志》:“公讳憺,字怀亮,河东舜原人也。祚灵妣汭,得□姚墟。”^[16]此志不仅提到妣、汭和姚墟,更记河东有一古地名“舜原”。但查遍《隋书》、新旧《唐书》、《通典》等典籍,皆无“舜原”这一政区名称。凡《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记载河东古迹风物者,多提及雷首山、妣汭水、历山、舜庙等,亦无“舜原”之记。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河东道一》有“长原,一名蒲坂,在(河东)县东二里,其原出龙骨。”^[17]考其所述和位置,殆非《姚憺墓志》所称之“舜原”。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荣和、刘钟麟重修之《永济县志·山川》:“舜原,在县北三十里,俗传舜所生处。虞原,在县南三十里,历山之东段,段干木旧隐地。”^[18]又,清乾隆《蒲州府志》,明蒲坂进士杨瞻字叔后,号舜原。根据上述记载,舜原位今永济县北,虞原居今永济县南(按其位置,应该就在芮城县东历山村一带),同姚墟一样,皆为概指之地理名称,非正式行政地域。其地名应为唐代时就存在,沿用至明清时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古称。然则隋唐墓志中称呼郡望使用非行政地名,十分少见。

[1](清)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第2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汉)司马迁撰《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第33页。中华书局,1959年。

[3]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四,第113页。上海人民

(下转 56 页)

三、广寒宫瓷枕的社会功用

瓷枕首先有安寝之用,随着社会功能的增多还可作为陪嫁之物和用于镇宅之威,多种社会功能伴随着丰富的装饰纹样,体现着一个时代曲折的社会心理,隐含着人们复杂的精神情绪。

1. 四幅吉祥图形的象征寓意

中国人的幸福观,首先提及的是古人对“吉祥”的看法。吉祥就是喜庆之事出现之前得到一种征兆,是表征人事美好前景的某些现象。这些征兆和表现本质上是人们所渴望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瓷器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了一种重要的吉祥图形的载体,表现着人们独特的艺术观,即通过吉祥图形的装饰表达民间的信仰和寄寓观念^[4]。

广寒宫瓷枕上正面广寒宫神话故事场景,传说中月宫里有一只白色的玉兔,她就是嫦娥的化身。因嫦娥奔月后,触犯玉帝的旨意,于是将嫦娥变成玉兔,每到月圆时,就要在月宫里为天神捣药以示惩罚。在瓷枕上堆塑广寒宫人物故事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希望能够在睡梦中像唐明皇一样夜游月宫,甚至希望得到一些长生不老的神药。

北斗就是北斗七星。道教认为祈禳北斗,可以消灭解厄,保命延生。诸葛亮在生命垂危之时也曾试图用他所知的奇门异术之一“北斗攘星大法”为自己求得12年寿命,可惜功败垂成。瓷枕由于其特殊的实用功能,每天与人亲密接触,人们遂赋予其避邪求福的含义。因此,在瓷枕上出

现拜北斗的场景是人们希望通过瓷枕上的神话故事来达到消除灾难和延长生命的美好愿望。

2. 广寒宫瓷枕的艺术价值

瓷枕不仅是日常实用品,更是难得的艺术品,它融造型、绘画、诗文、雕刻、色彩为一体,是多元艺术的综合品。广寒宫瓷枕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功能性与形式美的统一^[5],它既赋予了实用中的象征意义,又体现了瓷器坚固耐用、色泽光滑、彩釉不易脱落、不吸水、易清洗的特点。

广寒宫瓷枕枕面装饰纹样丰富,画面多取材于当时人们喜闻乐见、富有生活情趣的故事,它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心理状况相一致,是不可多得的实用类艺术品,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值得后人珍藏。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

[3][5] 陈金城《中国陶瓷艺术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钟福民《中国吉祥图案的象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武建亭,山西大同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武建文,大同一中)

(上接 31 页)

出版社,1984年。

[4]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十七上,第3538页。中华书局,1962年。

[5] 同[1],第5页。

[6] 乾隆版《平陆县志》卷十一古迹,第68页;卷十六杂志,第154页。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翻印。

[7]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6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8] 同[7],第934页。

[9] 同[7],第1849页。

[10] 同[7],第1824页。

[11] 同[7],第1774页。

[12] 同[7],第1471页。

[13] 同[7],第1541页。

[14] 同[7],第1624页。

[15] 同[7],第903页。

[16] 同[7],第965页。

[17]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第324页。中华书局,1983年。

[18] (清)李荣和、刘钟麟重修《永济县志》卷三,第10页。光绪丙戌年镌,县署藏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平陆县博物馆)